

◀ (上接2版)

analytic),无法卒读,遂得中辍。可是在《论性》等几篇近作,他却能将“先天辩证”的推论运用自如,去解析古典中国的哲学命题,其理解康德哲学的功力显然不可同日而语。[请注意拙文所用的康德英译本并非王国维阅读的英译本。“先天分析论”(或译“先验分析论”)乃是《纯粹理性批判》第一部分,而“先天辩证”(transcendental dialectic,或译“先验辩证”)才是第二部分。循理说,必得先明了“先天分析论”,方能掌握“先天辩证”的妙处。但也有学者认为“先天分析论”才是全书最难理解的。]

此外,在《原命》一篇,虽然王氏假道康德的议题,但他已能有别于康德,而提出异议,谓“责任”的观念自有其价值,而不必预设“意志自由论”为羽翼。王氏的意见真确与否并无宏旨,但显现了他渐获自信,有所拣择,不复人云亦云了。之后,王氏竟一度认为:之所以读不通康德,乃是康氏其说“不可持处而已”。前后对照,王氏判若两人。

果若王氏的确依循着研读康德,以思索中国文化相关的议题,这段时期他所刊行的代表作,恰恰透露了他阅读的轨迹。例如:《论性》(1904)与《释理》(1904)之于《纯粹理性批判》;《原命》(1906)之于《实践理性批判》;最后,《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1907)一文之于《判断力批判》。它们所涉的议题均呈现了与“三大批判”一一对应的情况。

于此,王国维心目中的哲学需得略加解析。他执着“纯粹之哲学”,而视其他哲学为杂糅之学。他曾抨击名重一时的严复“所奉者,英吉利之功利论及进化论之哲学耳,其兴味之所存,不存于纯粹哲学”,故难登大雅之堂。王氏主张知识之最高满足,必求诸哲学。他拳拳服膺叔本华的理念,谓“人为形上学的动物,而有形上学的需要”,故奉叔本华的形上学为“纯粹哲学”的典范。并以哲学为“无用之学”,方堪与唯美的艺术相比拟,同为人类文化至高的结晶。他且感叹中国故“无纯粹之哲学,其最完备者,唯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耳”。职是之故,梁启超和严复辈汲汲于追求经世致用之学,自是为他所不屑。他直言:“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而国人“为学术自己故而研究之者”,且不及千分之一。

一般认为王国维在1911年再次东渡日本,经罗振玉的规劝,方才改弦更张,毅然放弃哲学,步上研究国学一途。惟个人揣测在此之前,他恐尚未放



终其一生,兰克风尘仆仆地至欧洲各处,辛勤寻找、爬梳原始的档案,他所构作的史著无非是己身治史理念最佳的实践。

弃追寻西方哲理的念头;否则他断不会不辞舟车劳顿,将那些攸关哲学的洋书,随身携至东瀛,并暂存放京都大学图书馆。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可能一旦王氏旅日既久,以他的聪明才智和求知的热忱,不歇时便会知晓其时日本西方哲学研究的水平远非他所及;而在知己知彼之后,果要在治学上出类拔萃,善尽己之长,“返归国学”不失为正确的抉择。

总之,王国维的哲学工作或许仅止于此一阶段,而有其时代的意义,但真正影响及日后学术的发展,却是他接受西方史学以及接轨国际汉学的机缘。居中最关键的人物,不外是其业师藤田丰八和一路栽培他的罗振玉。

王国维之接受兰克史学(Rankean historiography),盖经由藤田的熏陶。藤田毕业于东京大学,该时恰是兰克关门弟子律斯赴日执教的时候,藤田一辈的汉学家不少受教于他,而受到兰克史学的洗礼。这同时是近代日本史学转化的契机。尤其当时日本“东洋史”的研究倾向,乃是向西方请益,而非向中国学习。而王氏最初认识兰克史学,也是因为藤田嘱其代为写序之故。

简之,兰克史学对日本或中国“新史学”的启示,最重要的无非是重视“原始史料”与史料的“系统”性而已。这点在藤田或王国维的史学实践发挥得鞭辟入里。王氏就曾对藤田氏攸关中国古代棉花业的分析称誉备至,其优点便是善用许多吾辈不能利用的材料,而引为己方憾事。要知王国维的学术生涯乃始自研究西洋哲学,因此纵使有接触兰克史学,其影响一时并不显豁。惟一旦他跨入文史领域,其作用则立竿见影。例如:他在准备《宋元戏曲史》之前,则先大量广搜材料,编纂了《宋大曲考》《优语录》《戏曲考源》和《录曲余谈》

(1909)等,这或可视为兰克史学典型的进路。

王国维步上国际汉学的另一引导者,正是罗振玉。其佐证之一,便是他少时素不喜《十三经注疏》,甫受新潮洗礼,即驰骋西学,游骑无归。此时却因罗氏规劝他“专研国学”,遂幡然一改旧习,尽弃所学;随罗氏请益小学训诂之事,并勤研《十三经注疏》,打下日后董理国学扎实的底子。这虽让他得以领会并承接有清一代的学术,却仍不足以尽道其日后绝大成就的底蕴;诚如他胞弟王国华

(1886—1979)所言:“先兄治学之方虽有类于乾嘉诸老,而实非乾嘉诸老所能范围。”又,王氏多年的挚友——金梁(1878—1962),且进一步称他“尤善于科学新法理董旧学,其术之精、识之锐,中外学者莫不称之”。

另有一项因缘亦不容忽视,便是罗氏和藤田毫不藏私地引荐了王氏同日本与国际汉学界直接切磋、交流,让他接引上实时性的学术议题,一展长才。总之,毋论就原创性的见解或开拓崭新领域两方面,日后王氏均能卓然自成一家之言,而为众望所归。且援引王氏学侣——狩野直喜氏概括王氏一生为学特色的评论,以为结语,他言道:

作为一个学者,王君伟大卓越之处,一方面在于凡是中国老前辈大儒才能做到的事,他都做得到。……可是因为他曾研究过西方的学问,所以在学术研究的方法上比以往的中国大儒更为可靠。换言之,他对西方的科学研究法理解得极透彻,并将之用于研究中国的学问,这是王君作为一个学者的卓越之处。《《回忆王静安君》》

要之,狩野氏所谓“西方科学研究法”,意谓着无非是世纪之际,被奉为“科学史学”(scientific history)圭臬的兰克史学。职是,谓王氏甚受兰克史学的影响,虽不中亦不远矣!所以说,西方哲学对王氏的影响是一时的,而西方史学方是恒久的。

最后,以傅斯年(1896—1950)的史学为终例。原初他留学英国,再转赴德国深造。于后者他深入学习历史及语言学,盖属成学的阶段。傅斯年所遗留《史学方法讲义》一书,因为残缺不全,故难窥其全貌,书中直接攸关兰克甚少,因此,只得另循其他途径,以蠡测他与兰

克史学的关系。西方思想史曾有一例,便是《维根斯坦的维也纳》(Wittgenstein's Vienna)该书两位作者采行“周遭旁证”(circumstantial evidence),爬梳维氏哲学志业的底蕴。由于维根斯坦之所以从事语言哲学在西方近代哲学界向来是个谜团,图尔敏(Stephen Toulmin)和其学生杰尼克(Allan Janik),便借重萧斯基(Carl Schorske)《世纪末的维也纳》(Fin-De-Siècle Vienna: Politics and Culture)的研究作为基底,烘托出维氏身处该时维也纳文化的危机,以证成维氏从事语言哲学的意义。这部作品令个人印象深刻。

析言之,“周遭证据”并不若“直接证据”来得直截了当,而是多少要添几分想象力,其效用主要是间接的“衬托”而非直接的“证成”。以傅斯年与兰克的关系,诚然傅氏言及兰克之处相当有限,但若执此以探究他与兰克史学的渊源,不免落下禅宗所云“死在字下”的执悟。因此必须另谋管道,方得一窥究竟。

傅斯年屡屡振臂疾呼“史科学即史学”、“史学便是史料学”等语,意图标榜自身的治史观点,但这几句鲜明的标语,日后不意却沦为他人攻讦的对象,甚至以“史料学派”讥斥之。

吾人若要标举中国近代史学的里程碑,有两篇大块文章绝不可以忽略:其一,是1902年梁启超所发表的《新史学》;其二乃是1928年傅斯年刊行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前篇系开风气之先,后篇则是机构的宣言;两者影响日后中国史学发展既深且远。先前,笔者对梁氏《新史学》业略有考述,于此不再赘言。《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毫无疑问系傅氏一生治学的纲领,也是傅氏史学最完整的陈述。而在学界最脍炙人口的便是:“历史学只是史料学”此一响亮的口号,其功过是非总缘此一论点,则必须先掌握傅氏对史学的定位以及赋予的任务,然后才旁及他所引进“史料”的新概念。

要之,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的史学在世纪之际的欧洲或德国,均面临强敌环伺,四面楚歌的窘境;但若干治史的精神,尤其对异文化的造访者却仍是新颖可喜,而为傅氏所摄取或继承。

读者只要稍加比对比兰克的论点,傅氏的史学源头就豁然开朗。兰克的《1494至1514年拉丁与日耳曼民族史》(Histories of the Latin and Germanic Nations, 1494—1514),向来被公认为西方近代史学的里程碑,它的序言学界尤耳熟能详。兰克说道:

历史曾经被赋予判断过去,

指导现在,以为未来谋福的职责。本书不希望有如许的需求,它仅是陈述真正发生的事实而已。

兰克的呼吁历史仅是“陈述真正发生的事实”(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初闻之下语调似极谦卑,实则不然。这句话正是近代史学的精神标帜,它象征历史的独立宣言,史学从此不再是神学、哲学的奴婢,亦非文学、艺术的附庸。

“史实自明”同为傅斯年反对“疏通”的理据。傅氏坚信:

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史学方法导论》》

若我们稍加推敲这些学科排名顺序的底蕴,不难察觉傅氏思路所反映的竟是西方史学演变的缩影。他避而不提传统旧学中压制史学的“经学”,反而突显西方文化独特的产物:“神学”与“社会学”,确是殊堪玩味的线索。这些学科均曾在历史的园地留下喧宾夺主的记录,所以傅氏重申史料方是历史的主体,只要整理好史料,事实就显豁了。

终其一生,兰克风尘仆仆地至欧洲各处,辛勤寻找、爬梳原始的档案,他所构作的史著无非是己身治史理念最佳的实践。他的治学风格诚如下一世纪中国的追随者——傅斯年所自勉的:

我们不是读书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

傅氏亟于找寻的“东西”就是“新材料”,居中特以直接史料为高。迥异于传统静坐书斋的文士,傅氏为中国史家所塑模动态的新形象,无非远绍西方的兰克。[虽然我揣测傅斯年所塑立的新史家形象取自兰克的治学特征,但此一句话似由英国史家崔威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1876—1962)转手而来。崔威廉于1903年发表《重新发现克里欧》(注:克里欧(Clio)为历史女神),旨在驳斥另一位史家伯雷(J. B. Bury, 1861—1927)科学史学之说。1913年崔氏修订后复收入《克里欧:一位女神》。该文形容敌对的学派“Collect the 'facts' — you must go down to Hell and up to Heaven to fetch them”。傅斯年所形塑的史家具有搜寻资料的动态观念,此与囿于饱读经史的传统学者有所区别。]

实言之,重视史料,尤其原始资料(original sources),并非始自傅斯年,之前梁启超、胡适受西学影响,业已阐发再三;

(下转4版) ▶